



廖承志的一生

本书承蒙中日友好协会及日本日中友好协会等友好团体的支持，
并得到廖承志家属和有关方面的协助，谨致诚挚的谢忱。

编 者

1984年3月

编辑者 新华通讯社摄影部

主编 卢学志

副主编 欧启明 许必华

执行编辑 张丰祺

宋佑民

张桂玉

资料编辑 张福来

出版者 新华出版社

发行者 讲谈社

印刷者 葛友印刷株式会社

用纸提供者 日本加工製紙株式会社

书名题字：邓小平

廖承志的一生

书名题字：邓小平



廖承志同志在中国长期革命
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也经历过严峻的考验。他
始终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斗
志不衰，工作不懈，是一个为共产主
义事业奋斗的坚定的伟大的战
士！

邓颖超 1984.1.

邓颖超题词：廖承志同志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经历过严峻的考验。他始终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斗志不衰，工作不懈，是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定的伟大的战士！



廖承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顾



可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1983年4月)

目 次

邓小平题写书名	1
廖承志像	3
邓颖超题词	5
廖承志与邓小平、邓颖超在一起	6
承志和我(代序) 经普椿	9
1908—1927	13
1928—1948	21
1949—1966	37
1967—1971	79
1972—1983	83
其他	164
我的童年 廖承志	169
我的母亲和她的画 廖承志	172
廖承志生年表	176

承志和我

(代序)

经普椿

他走了，走得是那样匆忙，没有留下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一个字。五十年的恩爱，半个世纪的坎坷，一起涌现在我饱含热泪的眼前，既模模糊糊，又清晰异常。

三十年代初，我的父亲经亨颐 and 伯母（后来成了我的婆母的何香凝）在上海是住在一块儿的，都在光裕坊，我家住七号，伯母住八号的楼上。我的父亲时常叫我去看望她，帮她买些日用品，或做些家务。一次在她家中看到一个穿长衫的年青人，对我介绍说，这是她的“侄子”，来看望她，很快就要走。我并没有在意。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我已经睡觉了。伯母家的佣人来敲我家的门，我的父亲叫我起来，一起到她家。我们看见两个法国巡捕带着一个双手戴手铐的年青人，这个年青人穿着一套旧西装。我仔细一看，发现他就是向我介绍过的“侄子”。一会儿，这个青年就被带走了。走以前，他在伯母的耳边悄悄地说了什么。走以后，伯母对我父亲说：“对不起你，



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在广东中山温泉宾馆（1983年2月）

经先生，这就是我的儿子廖承志，我以前没有告诉过你。”第二天，伯母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办公室，坐在吴铁城的客厅里。她对吴铁城说：“你要末把承志放了，否则，就连我一起抓起来。”她要吴铁城立即给她一个答复，没有明确答复就不走了。吴铁城无奈，只好给蒋介石打电话。通话后，吴铁城对伯母说，好，过几天你带他回去吧。这样，没有几天，承志就被放了出来。担保他出来的有三人：我的父亲、柳亚子和宋庆龄。这是我结识承志的开始。后来，我才知道，承志本来不住在他妈妈家里，他为了使妈妈知道他被捕了，就说自己是住在光裕坊八号。这样法国巡捕就把他带到了他妈妈的家。他用这种机智的办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告诉了母亲。

承志被释放以后，伯母就把他关在家里，

有一个多月不让他出门。这样，我们俩就渐渐地熟悉起来，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我发现他多才多艺，会唱歌，会绘画，懂外文。他当时画的一幅我的肖像油画，一直珍藏至今，挂在我的卧室的墙上。

一九三三年五月，我离开上海回浙江老家去了。八月，承志突然离开了上海，行前留下了三封信，一封给他妈妈，一封给柳亚子，一封给我。给柳亚子的信至今还在，已在广州的“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中陈列。信中请求柳亚子先生照顾他的妈妈，并含蓄地说自己为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走了，请柳亚子先生放心云云。给我的信已在一九四二年我从香港出走时失落了。但主要内容我还记得，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你真正爱我的话，请再等我两年。从此，差不多有四年时间，我不知他的音讯。其实，这四年承志一直给我写信或打电报，因我的哥哥反对我同承志交往，将承志这几年给我的函电都给扣压了。

一九三七年秋天，潘汉年从延安来到上海，给我带来了承志的一封信，信中说 he 很快就要到香港去。我看到信后，就去找伯母，她也收到了承志的信，正准备去香港，已买好了船票，第二天就动身。她对我说，你同我一起去香港罢。我说，我没有船票呀！她说，不要买票了，你就作为我的护士好了。就这样，在一间一等仓里，她睡在床上，我睡在床前的地板上，去到了香港。

我在香港等了个把月，一九三八年一月，承志来到了。一月十一日，我们就在香港结婚。婚后，我们感情甚笃。承志是革命者，身负重任，工作相当繁忙，很少回家。有时，忙不过来，他也叫我干一点事。记得有一次，他拿回

来一个箱子，让我送到一个地方去交给一个人。我问，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呀！他没有说话。我打开箱子一看，原来是一箱满满的美钞。我说，我可害怕。他笑着对我说，你不用害怕，你送去好了，不会出事的。我就壮着胆送到一个地方，果然看见承志讲的那个人正在等我。我把箱子交给这个人后，赶快就走了，心里还忐忑直跳。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攻打香港。我们当时住在九龙。一天清晨，承志急匆匆突然回家，叫我和妈妈快走。我问，什么事呀！承志说，日本人打来了，你们还不快走。我抱着坚坚，怀着恺孙，从九龙跑到香港，住在蔡廷锴家里。当时蔡家已没有人住了。日本先侵占了九龙，接着又占了香港。有一回，日本兵来搜查，幸亏他们不认识妈妈，他们问妈妈是干什么的。妈妈用日语说，我是给这家看房子的。他们又问，你怎么会讲日语。妈妈随口骗他们说，是在日本开茶叶店的。

眼看在香港就不下去了。妈妈和柳亚子等带着我和其他一些人乘上了一艘木帆船，打算去海丰。本来两天就可到达东江，可是遇到了风浪，船在海上漂了七天七夜。水和食物都吃光了。这时正好遇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巡逻队。当他们知道是廖仲恺的夫人在船上，立即送来了甘薯、饮水、奶粉等，我们靠这些食品，总算平安到了海丰。妈妈一九四二年作的诗《香港沦陷回粤东途中感怀》，就是写的当时的情景。

一九四二年夏天，我随妈妈住在韶关。连贯告诉我们，春天，承志在广东乐昌时由于叛徒出卖，又被捕了，但不知关在什么地方。大

约在一九四三年，有一天晚上，一个陌生人来敲我家的门。我问他找谁。他说有事相告。说完他把雨伞扯下来，从竹制伞柄中取出一封信交给我。我一看，是承志从江西监狱写给我的。信中写着，自己被关在江西监狱，死不足惜，但决不做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百姓的事，要我放心。这个陌生人姓姚，是江西监狱中的工作人员，承志经常对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很同情承志的遭遇，决计去延安找共产党。承志就让他到广东来找连贯、乔冠华等人联系。听说，这个人后来真的到延安去了。

承志直到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才从重庆监狱放出来。我们重逢后他同我讲起被关押期间同蒋介石见面的情景。在见面前，监狱当局给承志量做衣服，为他理发。后来，来了一辆小汽车，载着他在重庆歌乐山上转来转去绕圈子。然后到一幢房子前面停了下来，进门在一间房中坐了大约十分钟，蒋介石走了进来，承志坐着未动，看了蒋介石一眼。蒋介石先说话了：“辛苦啦，只要你不再给共产党做事，我一定重用你。你不要忘记，你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后代，不要对不起他们。”承志说：“我只有现在这样做才对得起他们。”蒋介石又说：“既然如此，你就不要后悔。”承志没有再说话。蒋介石只好走了。承志又被带回监狱。回监狱后，其它待遇都没有改变，伙食倒改善了。本来一天只给两碗饭，饭中加了点盐，有不少砂子，还掺了水。要想多喝一点水都不行。后来改成中午、晚上均有菜、汤。承志心想，恐怕蒋介石见我不思悔改，让我吃好一点，要送终了。其实，那是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后签订的“双十协定”中的条款之一即“释放政治犯”所规定的。同时，宋庆龄和妈妈又不断向蒋介石提出放人要求。

就这样，迫使蒋介石将承志列入交换政治犯的名单，获得了释放。

承志出狱后，立即就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到了四月七日，承志告诉我，我们明天去延安，要买什么东西赶快去买。我就买了延安缺少的水水瓶、饭盒等日用品。晚上，承志出去开会。我把随身物品收拾好，装在一个旧皮箱中，就睡觉了。清晨五点左右，承志才回来。他对我说，我们今天不走了，周恩来要我去广州，处理东江纵队撤到山东的事。我说，你开了一个晚上的会，现在该休息了，我去飞机场送回延安的人。天下着毛毛雨。回延安的人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驾驶员是美国军人，秦邦宪、叶挺、王若飞、邓发等都上了飞机，还有替补我们两人的王若飞的舅父和他的侄子。到了下午，我们还没有收到飞机到达延安的消息，打电话到西安询问也没有。后来经美军派飞机寻找，发现飞机已坠毁，十七名乘客和四名驾驶员全部罹难。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四八惨案”。承志和我都非常悲痛。每每提及此事，承志一再说，我们活着的人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同志，我们要把他们未竟的工作担当起来，加倍努力地民族的解放而斗争。

我和承志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回到了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承志当时任新华社社长。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先走吧，我还不能走，我要随同新华社大队人马去太行山区。因我刚生下笃笃不久，承志就将他的马给了我，嘱咐我不要为他的安全担心。承志就是这样一个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的人。抗美援朝期间，承志去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坐着吉普车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奔驰，有许多次几乎被轰炸机炸中，而总是奇迹般地脱险。承志回国后对我讲起在朝鲜的经过，我听了都心惊胆战。他却以幽默的语言说，“恐怕我的命大，还不到向上帝报到的时间吧。”

新中国成立后，承志担任了一些方面的负责工作，但他严以律己，生活十分俭朴，住房、穿衣、用餐，都非常随便。妈妈生前是国家领导人，公家将一辆高级轿车供妈妈坐。承志经常对我们家属说，这是国家给妈妈的座车，我们不要随便动用。一九七二年，妈妈逝世后，承志认为，我们住在原来的地方太大了，不合适，就要求搬到目前我们住的较小的院子里来。他自己的卧室兼办公室大约二十平方米，这间房中，放了几个书柜和书架，一只小圆桌，再加上办公桌、衣柜、床、急救用的氧气瓶等，几乎连转身都困难了。

承志对他的妈妈非常孝顺，妈妈健在时，他每天早上要到妈妈的房中请安问好。而妈妈总是亲昵地叫他“肥仔”。“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为保护承志免遭“四人帮”的毒手，就将承志藏在北京的一个地方。我每周去看望一次，一见面，承志总是首先询问妈妈身体好不好，饮食如何。妈妈也时刻惦记着儿子，发现儿子怎么不来向她请安了，就问我们，我们只好说，承志工作太忙不能回家。一九七〇年，妈妈摔伤了腿，住医院治疗。这时，我十分着急，就给周总理打电话，报告了这个情况，请求让承志去医院看望他妈妈。周总理当即同意，并立即派汽车来接我，再由我去接承志到医院去。妈妈好久不见儿子，现在看到了，非常高兴，母子俩亲热地交谈起来。过了一会儿，周总理也赶到医院看望妈妈。一九七二年九月一

日，妈妈去世了。承志将妈妈的灵柩护送到南京与父亲合葬，并敬书了“廖仲恺何香凝之墓”。从此，每年清明节，承志总不忘悼念双亲，并几次去为双亲扫墓。一九八三年五月中旬，承志和我还去了南京，这是他最后的一次扫墓。当时，承志还写了一首诗：“金陵无限好，来到正清明，信笔纪心事，鲜花唁老亲。”这是承志的绝笔诗作。

一九八〇年五月，我陪承志从美国施行心臟搭桥手术后回到北京。承志遵照医生嘱咐，注意饮食，使体重有了明显的下降。有一天，他高兴地对我说，你看，我的身体不是完全恢复健康了吗！其实，我心里十分明白，不管外表看起来如何，像承志这样心脏有病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康复的。从那时到承志一九八三年五月下旬住进医院，整整三年，承志承担了比一个健康的人还多得多的工作，几乎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从来没有星期天。有时一天会见的日本朋友、外籍华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华侨，多达七八起，直至深夜。回到家里，还有不少重要文件需要阅读，还要给群众来信签署意见。最后在床上，还翻阅日本、港澳的书报。承志这三年真是拼着命地工作啊！许多朋友都劝他注意健康，他都一笑了之。我也经常提醒他，他同样以微笑来回答。我们都被他的笑容征服了。

承志去了，他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又回到了他一生敬重、孝顺的双亲身边，他可以日日夜夜地与双亲长谈了。他们一定又在谈及两代人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终生的未竟之事。放心吧，我们幸存的人会担当起来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日于北京



1908-1927



2 廖承志1908年9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大久保。原籍广东惠阳鸭仔埗。襁褓中的廖承志（左前）与父廖仲恺、母何香凝及姐廖梦醒在东京留影。

廖仲恺与何香凝于1897年10月在广州结婚。他们为探求救国真理，于1902年秋、冬先后赴日本留学。1903年，他们在日本与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相识，此后即追随孙中山先生献身革命事业。廖仲恺、何香凝都是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最早的会员。